

诗学

2012
第四辑

SHI XUE

吕进 熊辉 ◎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诗学

2012

第四辑

吕进 熊辉◎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学. 第4辑 / 吕进, 熊辉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12.11

ISBN 978-7-5531-0167-5

I. ①诗… II. ①吕…②熊… III. 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2810 号

诗学 (第四辑)

吕进 熊辉 主编

责任编辑 潘伟娜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0.125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1-0167-5

定 价 26.00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诗学》编辑委员会

主 任:吕 进

主 编:吕 进 熊 辉

委 员:陈本益 代 迅 古远清 蒋登科

梁笑梅 陆正兰 骆寒超 毛 翰

蒲华清 邱正伦 王 珂 万龙生

熊 辉 向天渊 杨本泉 张传敏

张立新 许世旭(韩国) 岩佐昌璋(日本)

目 录

卷首语

一群人诗意的坚守 吕 进 熊 辉(1)

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主持人:熊辉)

诗体重建视角下的何其芳 吕 进(7)

精致的姿态

——何其芳文学史观的系谱学阐释 向天渊(14)

试析何其芳翻译诗歌的深层动因 熊 辉(34)

“变色”与“色变”:文学史叙述中的何其芳 白 杰(42)

“中国现代诗学”栏目(主持人:张传敏)

为胡适发疯至死的女子

——兼谈胡适两首诗作的解读 陈漱渝(54)

现代诗语的“机密”:能指与所指的离散张力 陈仲义(68)

一个华裔诗人在美国写诗的经验 非 马(85)

重庆《小诗原》与新诗“七月派” 辛文纪(93)

格律体新诗研究(主持人:万龙生)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及其深远影响 万龙生(99)

再论“对称原理”在新诗节奏格律体中的统摄作用 孙逐民(124)

硬币的两面 方红辉(135)

当代汉语诗坛二元格局中的诗体重建 王端诚(137)

浅谈格律体新诗和传统诗词的关系 陈仁德(149)

研究生论坛(主持人:梁笑梅)

论新诗节奏的审美原理 林泽南(155)

“兴”与“象征”辨析 林少雄(171)

90年代新诗“边缘化”现象解读 李胜勇(187)

分离与融合

——莱辛、苏轼诗画观比较研究 徐若冰(203)

内迁诗人作品中的抗战重庆 朱抒宇(217)

论当代生态诗歌的传播策略 吴凡(234)

音乐文学研究(主持人:童龙超)

流行的颓废情怀:论林夕歌词的传播 黄笑愉(250)

王独清前期诗歌对魏尔伦诗歌音乐观的接受 聂兰(264)

重庆诗人访问记(主持人:吕进)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诗人何房子访谈录 刘艾 徐小峰(277)

瓷器和密林的舞动

——重庆诗人雨馨访谈录 荆宏侠 郑慧婷(291)

诗学序跋(主持人:张立新)

兵气拥云间

——朱增泉三部诗集总序 吕 进(305)

诗人黄亚洲

——序黄亚洲《没有人烟》 吕 进(311)

一群人诗意的坚守

吕进熊辉

一种诗歌观念的形成和固化，除需要有勇气的开拓者之外，一群人甚至几代人的坚守与倡扬更是不可或缺。如此这般，曾经的“先锋话语”抑或“不经之谈”，才能在契入历史的同时呈现出自身的发展轨迹。

每年六月，中国新诗研究所既洋溢着丰收又弥漫着离愁。毕业暨授位典礼上，看着学生脸上灿烂的笑容，内心涌起一股蜜意，是为他们寒窗苦读之后的收获由衷地高兴，也是为新诗研究所培养了又一批文化人才和教育工作者而自豪。当往日的生活片段伴随着感伤的音符出现在眼前时，无法阻止的离别便横亘在彼此不愿分离的心间。明日天涯，怀揣着同学的情谊和老师的祝福，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学子将创造怎样的诗意人生？其实，几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同学们得到的有丰富的知识和处事之道，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治学风格和学术精神也深深地对他们产生了气质型影响。不管走到哪里，也无论身居何处，新诗所学人都业已成为坚守诗意和励精图治的符号。二十六载之后，三百五十多名新诗所校友散布全球各处，让中

国新诗研究所的布景成为诗学界蔚为壮观的奇迹。此去今年, 岁月山高水长, 还会有多少人会加入新诗所学人的群体, 还有多少人会成为熠熠生辉的诗坛之星? 结果不言而喻却又值得期待。

炎热的暑期即将来临, 中国新诗研究所从东风楼再次搬回了荟文楼,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物理位移, 而是一次新诗研究所学人心路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在整理历史资料的时候, 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来访的各类诗人学者以及出版的期刊资料等, 这些历史的碎片将人带入清晰的历史现场。臧克家的题字、冰心的祝贺、旅美学者叶维廉与吕进的会晤交流、已经千古的韩国学者许世旭的讲学等等, 每每看见发黄的照片和一触即损的报纸, 心里就会升腾起沉重而欣喜的情愫。中国新诗研究所一路走来, 虽然遇到或还将遭遇诸多不愉快的事件, 但新诗研究所的学人们始终能够“守住梦想”, 那些光辉的瞬间足以定格一个时代的诗歌盛况。与此同时, 内心的忧思也油然而生, 新诗所二十六年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 在未知的旅程中, 我们何去何从? 回想起来, 新诗所校友无论走到哪里, 见面后聊得最多的还是在新诗所学习的日子, 最后都会关心地询问新诗所的近况。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新诗研究所早已不是驻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所, 也不是我们人生旅途中可有可无的驿站, 她是整个新诗所学人想起来就温暖的家。也正是如此, 不管新诗所学人分居何处, 只要我们秉承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学术思想, 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品格, 未来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依旧会枝繁叶茂。

今年是著名诗人何其芳的百年诞辰, 作为重庆文化界的杰出代表, 他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创作和理论界享有盛誉。中国新诗研究所处身重庆, 自然应该在具备世界眼光的同时, 关注重庆本土诗人以及从重庆走出去的诗人。因此, 本期《诗学》刊发了中国新诗研究

所学人的四篇文章，各有深意而又眼光独到：吕进先生的文章主要探讨了何其芳的诗学思想对当前诗歌形式建设的重要启示；向天渊的文章是对何其芳文学史观的初次探索；熊辉的文章首次接触到了何其芳的诗歌翻译问题；白杰的文章则是对何其芳文学形象与文学史形象的探究。本期的“现代诗学”栏目显示出宽广的视域，陈漱渝先生的文章是对开白话诗风气之先的诗人胡适的“外围”研究；陈仲义先生的文章则是用西方的诗学理论研究中国新诗话语；辛文纪先生的文章是对诗歌史料的研究；美国诗人非马的文章则探讨了流散诗人的创作体验。立足本土与放眼华文诗歌是中国新诗研究所坚持的理念，本期继续推出了“重庆诗人访问记”，访谈了何房子和雨馨两位青年诗人，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一代诗人成长的焦虑与执著的奋斗。“格律体新诗研究”栏目主要刊发了五篇对现代格律诗研究的文章，其中既有诗人思想的研究，也有普适性的理论探讨。

中国新诗研究所设置了音乐文学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在全国范围来讲都属少有的研究领域。相应地，《诗学》设置了“音乐文学研究”栏目，本期刊出了中国新诗研究所学生研究林夕歌词的文章，是流行的大众文化与高雅的诗歌艺术的统一；而对王独清诗歌音乐性外来影响的探讨，加深了我们对歌词之外的诗歌外在音乐性的认识。中国新诗研究所本年度的毕业论文依然有很多研究诗歌的选题，这期“研究生论坛”刊发了六篇文章，是本届研究生诗学思想的集体展示。很多精辟的诗学观点往往来自于对诗歌作品的研究和解读，因此那些认真撰写的诗集序跋，无疑时时会有诗学思想的闪光。本期“诗学序跋”刊发的两篇文章，可以让我们发现更多鲜活的诗学思想。

感谢有关方面和读者、作者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本期

《诗学》出版之际，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也即将开幕，在此，特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诗学名家表示热忱的欢迎，和着巫山红叶的秋韵，让我们共同祝愿这次诗歌盛会取得圆满成功！

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

主持人语（熊辉）：

何其芳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著名的诗人，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便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1945年出版了诗集《预言》和《夜歌》。何其芳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同时也致力于建构中国新诗格律理论，是中国新诗史上少有的将诗歌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的诗人，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理论早已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

今年是何其芳先生的百年诞辰。2012年4月6日至8日，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参与主办、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的“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三峡学院隆重召开。中国新诗研究所是国内最早从事新诗研究的实体单位，在建所26年的历程中，我们秉承吕进先生开创的“上园”道路和“转换”观念，成为中国新诗研究版图上独具特色的高地。一直以来，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师生都在不间断地从事着何其芳研究，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绩，不断彰显诗人的历史意义和当下启示。本期《诗学》选登了几篇中国新诗研究所学人研究何其芳的文章：吕进教授的论文《诗体重建视角下的何其芳》，主要探讨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对当下诗体建设的积极意义；向天渊教授的论文《精致的姿态：何其芳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谱系学阐释》，主要探讨何其芳文学批评体现出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熊辉教授的论文

《试析何其芳翻译诗歌的深层动因》，主要探讨何其芳译诗与自我情感表达的关联；白杰先生的论文《“变色”与“色变”：文学史叙述中的何其芳》，主要讨论了何其芳的文学史地位与作家角色的转换。

特设“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栏目，以示中国新诗研究所对伟大诗人的纪念！

诗体重建视角下的何其芳

吕 进

诗体重建是摆在新诗面前的美学使命。巴渝之地的诗歌资源非常丰富多彩。尤其是三峡地区，是一片神奇的诗歌沃土。到了 20 世纪，新诗诞生，三峡地区这个诗歌之都又为新诗发展史相继推出众多闪闪发光的名字，何其芳就是最负盛名的一位。今年是何其芳诞辰 100 周年，在诗歌重建的使命面前我们更加怀念先行者何其芳。

百年新诗发展到了今天，必须在“立”字上下功夫了，必须坚决地推行“破格”之后的“创格”。时不我待。

重破轻立，一直是新诗的痼疾。新诗需要在个人性与公共性、自由性与规范性、大众化与小众化中找到平衡，在这平衡上寻求“立”的空间。当年梁实秋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一文里说过：“新诗运动的最早几年，大家注意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重破轻立最明显地表现在诗体建设上。长期以来，不少诗人习惯跑野马，对于形式建设一概忽视甚至反对，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创作自由。新

诗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在“解放”后的第二天，从“诗体解放”到“诗体重建”本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胡适讲得好：“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的确，翻翻古代诗歌史就会发现，“风谣体”后有“骚赋体”，“骚赋体”后有五七言，五七言后有“诗余”——词，词后有“词余”——曲。

如果说，散文的基础是内容的话，那么，诗的基础就是形式。爱情与死亡，诗歌唱了几千年，还是有新鲜感，秘密正在于诗的言说方式的千变万化，诗体的千变万化。

新诗之新绝不可能在于它是“裸体美人”。对于诗歌，它的美还在衣裳。新诗的内容必须形式化，“裸体”就不是“美人”了。新诗，一定有自己的诗体。应当说，没有诗体就没有诗歌。

诗的本质是无言的沉默。以言传达不可言，以不沉默传达沉默，以未言传达欲言，要靠诗歌特殊的言说形式。这形式依靠暗示性将诗意置于诗外和笔墨之外，这形式带有符号的自指性，它是形式也是内容。散文注重“说什么”，诗歌更看重“怎么说”。诗的审美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都与诗体有关。作为艺术品的诗歌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诗人运用诗的特殊形式的成功程度。

回顾新诗的历史，闻一多“勒马回缰写旧诗”，臧克家“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在新诗人中，绝不是个别现象，这反映了新诗人对形式的困惑。其实何其芳至少早在1944年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了他的思考。他写道：“中国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尚未解决。从前我是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动摇了。”这是先行者的敏感和智慧啊！

中国诗歌的三千年历史上，最早兴起的是自由诗，但是最有成

就的是格律诗。严格地说，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就是格律诗传统，中国几千年诗歌培育出的读者就是格律诗读者。所以，自由诗基本是百年新诗的单一诗体，这显然是一个大缺憾，给新诗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效应。新诗百年仍未在中国大地上立足，不能不说，新诗在诗体上的单向发展是一个重要原因。废名当年曾在《新诗应该是自由诗》里宣称：“我们新诗就应该是自由诗，只要有诗的内容，然后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怕别人说我们不是诗了。”这毕竟是新诗早期之论。但有人至今居然还坚持说，“自由”就是新诗的特点，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是诗人的权利，这至少是不负责任之论。闭眼不看新诗当下的困境，闭眼不看诗人当下振衰起弊的努力，还固守这种“理论”，还生活在废名的年代，实在令人费解。

对于任何艺术，都没有无限度的自由。自由体新诗也有文体边界。何其芳有一句话：“文学艺术没有什么绝对自由的形式，只有比较自由的形式和由于作者运用得熟练而成为比较自由的形式。”自由诗需要提升与规范，需要守住诗之为诗、中国诗之为中国诗的“常”，守住新诗文体的几何学限度，守常而后求变，才会是中国诗歌之变。与自由诗并肩而立的应该还有格律体新诗，这不独中国，而是全世界的诗歌现象，无论欧美，还是亚非。与篇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顿的自由诗相比，格律体新诗寻求相对稳定的有规律的格式和韵式。

倡导现代格律诗最有影响的是闻一多。新诗对旧体进行“破”，闻一多则是对新诗进行“破”后之“破”的第一人。闻一多将新诗从“爆破”推向“建构”，从“破格”推向“创格”，将新诗推入了第二纪元。闻一多以“三美”为核心的现代格律诗理论，至今对于中国格律体新诗建设保持了一定影响。何其芳说：“你不能不承认他（指闻一多——作者按）用这种方式也写出了一些好诗。这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例：证明新诗里面的格律诗是可以创造成功的。”

将格律体新诗建设继续推向前进的代表性人物是何其芳，他的格律体新诗理论是长期思考与实践的成果。

对于新中国的现代诗学，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政治论诗学时期。在引进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努力创造新时代的新诗学的同时，却在诗与政治的关系上，走向了极端，使得诗学的独立性、诗评家的独立人格都走了样。诗学成了政治的应声虫，诗评家的依附性人格随处可见。在新时期以前，现代诗学的成就非常有限。在今天看来，这个长长的时期，给后来者留下的诗学遗产并不多。随着政治环境的日趋反常，现代诗学的正面建树越来越少。何其芳在这个时期是个亮点。作为有诗歌创作成就、有宽阔文化视野的诗人，何其芳有更多的文体自觉，对诗的本质、诗的文体有比同时代人更多的敏感与思考。可以说，何其芳是能够进入诗的内部对诗进行艺术观察的为数不多的当代诗评家之一。

何其芳对于现代诗学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他在1953年在北京图书馆主办的讲演会上提出的诗歌定义；一是他在1954年发表了《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前者主要是就自由诗的形式问题发表意见，后者则是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的构想。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家。新诗作为中国古诗的对立面出现，彻底否定古诗，是不正常的，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新诗只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而已。何其芳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如果没有适合它的现代语言的规律的格律诗，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健全的现象，偏枯的现象。”在《再谈诗歌形式问题》一文中，何其芳又说：“要解决新诗的形式和我国古典诗歌脱节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建立格律诗，就在于继承我国古典诗歌和民间诗歌的格律的传